

文稿

東海大學誕生的故事(上)*

梁碧峯**

1950年代，美國「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之所以會在台灣創辦東海大學，有它的現實與理想的層面。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因中國共產黨的無神唯物論關係，不允許宗教辦學。故於兩年內，相繼在1951年5月前，所有的教會大學，被迫停辦或與其他學校合併改組，其校舍都被沒收，不再具有教會大學的本質。當時在中國大陸的教會大學包括有(括註創校年份、創校團體)：

南京：金陵大學(1888年，美以美會)；金陵女子大學(1915年，美北長老會、美以美會、監理會、美北浸禮會、基督會)

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年，美國聖公會)；震旦大學(1903年，耶穌會法蘭西省)；滬江大學(1911年，美南浸信會、美北浸禮會)

蘇州：東吳大學(1900年，美國監理會)

杭州：之江大學(1897年，美南長老會、美北長老會)

北京：協和醫學院(1906年，倫敦會等)；燕京大學(1919年，美以美會、美國公理會、美北長老會、倫敦會等)；北平輔仁大學(1925年，本篤會)

天津：天津工商學院(1920年，法國耶穌會)

濟南：齊魯大學(1904年，美北長老會、英國浸禮會等)

武漢：華中大學(1906年，美國聖公會、雅禮會、復初會、英國循道會、倫敦會)

長沙：湘雅醫學院(1914年，湖南育群學會、雅禮會)

福州：福建協和大學(1916年，美以美會、美國公理會、美國歸正會、英國聖公會)；華南女子大學(1916年美以美會)

廣州：嶺南大學(1888年，美北長老會等)

成都：華西協和大學(1910年，美以美會、公誼會、英美會、浸禮會、聖公會)

1949年後尚存教會學校，2年後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管，1952年全被拆分重編。而後在台復校，有：基督教衛理公會東吳大學與天主教輔仁

* 編者案，是篇長達八十餘頁，限於版面，分為上、中、下三期分載，謹向作者致歉。

** 東海大學化學系退休教授

大學。

由創辦到 1949 年，這個基督教的「聯合董事會」已經與中國大陸 13 所知名的長老教會高校建立了聯繫。該機構與中國大陸的聯繫於 1951 年起中斷了 30 年，但是它還為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提供支援。因此，美國基督新教會於 65 年前在大陸的基督教教育事業 13 所大學宣告終止了 30 年，到 1980 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可讓教會部分工作恢復。1949 年前，美國紐約基督新教會曾對中國大陸的教育發展有過極大的貢獻。以高等教育而言，過去曾在中國大陸先後創辦了 13 所頗負盛名的基督教大學。它們是：

華北：燕京大學(北平)、齊魯大學(濟南)

華東：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南京)、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上海)、東吳大學(蘇州)、之江大學(杭州)

華中：華中大學(武昌)

華西：華西協合大學(成都)

華南：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福州)、嶺南大學(廣州)

其中校齡最早的是聖約翰大學，創校於 1865 年。最充實的，則要算可與清華、北大在北京鼎足而三的燕京大學了。這 13 所基督新教會大學，對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都有特殊的貢獻。迨中國大陸沉淪，這些大學全被迫停辦，教會的教育事業遂陷於停頓。當時對恢復的期待甚深，但因韓戰爆發而落空，之後，該會也面臨存廢之抉擇。1951 年 5 月的年會上，新任的執行秘書長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提出了關鍵性的演講：「視野，無限」(Horizon, Unlimited)，引起了新的展望，取得與會者的共識：「將更進一步把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想伸展到中國大陸以外的亞洲地區」。接著，該會因關切面的擴大，而於四年後(1955 年 5 月)更名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UBCHEA)延續至今(以下簡稱「聯合董事會」)。

為響應自由中國台灣的國內外基督教領袖之熱心奔走及籌劃，聯合董事會於 1955 年協助東海大學在自由中國土地上台灣的台中創校。當今，東海大學除了是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之一成員外，另積極參與海內外高等教育聯盟組織：目前為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亞洲基督宗教大學聯盟(ACUCA)及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ICHET)等國際組織成員。

(一)UMAP 是 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的簡稱，全名亞太大學交流會。本會成立於 1993 年，是由亞太地區官方與非官方(尤指各大專

院校之聯合組織)高等教育組織代表所自發組成的協會，以每個國家及地區一席為原則。UMAP 的目標為藉著加強亞太地區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合作以及各大學彼此間學生與教職員的交流，以期能達到亞太地區不同國家與不同地方之間文化、經濟社會制度的相互了解。

(二)亞洲基督宗教大學協會(英語: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Asia), 簡稱 ACUCA, 是一個亞洲地區的基督宗教大學與學院機構, 致力於教育領域的基督教信仰服務事業, 現由 57 個成員學校所構成: 香港 3 所, 印度 2 所, 印尼 12 所, 日本 10 所, 韓國 9 所, 菲律賓 9 所, 臺灣 9 所, 泰國 4 所。本校為隸屬該聯盟之會員學校。

(三)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FICHET),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以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技職教育協會等三個高等教育組織作為基礎, 在教育部補助及各會員校捐款下, 於 2005 年完成設立與登記, 並於 2006 年 1 月開始正式運作。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之設立宗旨為代表我國參與國際高等教育學術活動, 藉由結合各會員校院力量, 促進經驗交流、資源共享, 推動與各國程度相當之高等教育組織的合作交流, 並期能擴大我國在國際學術界的活動舞台。

壹、美國紐約的聯合董事會教育機構設立宗旨

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聯合董事會(UBCHEA), 是一個維護亞洲基督教教會利益的亞洲地區非贏利的高等教育管理機構, 與亞洲各國各地區的基督教教會大學保持著密切聯繫, 以促進這些大學之間的資訊溝通, 為他們在學術上的交流創造條件, 支援教會大學的發展, 並在經費上給予一定的支援。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或簡稱聯合董事會, 是一個自主的機構, 在 100 位董事中, 有半數是代表北美各教會海外宣教部, 另外半數是一般的代表。它是經美國紐約州大學董事會特許備案的一個教育機構。

1922 年 10 月 1 日, 中國的三所基督教大學: 金陵大學、燕京大學與齊魯大學, 在美國紐約成立了一個聯合辦公室。其所開一個單間辦公室, 新租戶的門牌位於紐約市第五大道 150 號。中國聯盟大學的中央辦公室是由三個受託大學成立, 單純以協調他們在北美的活動, 如採購物資和資金的籌集與運用。而後, 聯合董事會之前身--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 成立於 1932 年, 到了 1945 年, 才合併為一個單一機構, 肩負起協助亞洲其他基督教大學之責任後, 到 1949 年, 這個「聯合董事會」已經與中國 13 所知名的高校建立了

聯繫。該機構與中國的聯繫於 1951 年中斷了，但是它還為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提供支持。直到 1956 年，才正式更改為現在的名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BCHEA)，其聯合董事會的宗旨亦經修正為下列內容：「聯合董事會之基本宗旨是為促進基督教高等教育，特別是在東方及東南亞各國，發展急需之教育事業及學府；支持正當合理之教育計劃；推行有效之教育方針；在重質不重量之原則下，務必使基督教高等教育在該地區，成為人民及教會生活中一股真正有效之力量。」

直至 1980 年，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BCHEA)應邀恢復了在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作。此後，它為中國的多所大學的研究項目、人員培訓和教師發展提供撥款，尤其關注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師範學院。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還支持召開多次學術會議，並資助一些西方學者、專家到中國來做訪問學者。

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的許多撥款旨在支持宗教學領域，但是又不局限於此。提供助研、助教教學金的學科領域十分廣泛，包括會計學、心理學、語言學……等，特別是西藏大學和其他一些中國大陸西部院校的很多員工，亦被資助到更先進的各大學進修研究生課程。目前，已有幾個撥款支持英語教育項目，還支持南京師範大學進行社會工作者的培訓。現在的撥款項目也開始通過支持員工領導力和發展的項目，來支持中國大陸西部高等師範院校的發展。

截止到 2003 年 6 月 30 日，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ACUCA)用於撥款和管理費的總支出約為 8 百萬美元。其中約 6 百萬美元來自該機構的本金。其他資金來自私人捐款、私人基金會的撥款和美國政府的撥款。2015 年，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過去幾年一直贊助亞洲基督宗教大學協會，該會目前希望能與台灣亞洲基督宗教大學協會之會員學校，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係。Dr. Cynthia Yuen 主要負責東北亞地區的助學金與各項計畫，於 2015 年 4 月與夏龍副主席(Dr. Glenn Shive)來臺參訪 ACUCA 會員學校，希望討論未來各種合作計畫。

成立於 1976 年的亞洲基督宗教大學協會(ACUCA)，其所建立的高等學府在亞洲基督教機構名副其實的社區，做研究和教學緊密合作，促進世界和平。目前其成員是由日本，中國，台灣，韓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等有關大學院校而構成的機構。ACUCA 是一個亞洲地區的基督宗教大學與學院機構，一直致力於教育領域的基督教信仰服務事業，現在 2015 年是由 57

個成員學校所構成：香港 3 所，印度 2 所，印尼 12 所，日本 10 所，韓國 9 所，菲律賓 9 所，臺灣 9 所，泰國 4 所。2012 年至 2014 年間，由輔仁大學校長江漢聲擔任 ACUCA 理事長。2015 年至 2016 年間，由印尼萬隆天主教大學 (Parahyangan Catholic University) 校長擔任 ACUCA 理事長。

一、聯合董事會成立的使命與願景

1. 聯合董事會的使命

亞洲聯合董事會基督教高等教育工作目的是支持在亞洲的基督教存在的大學及學院。

2. 聯合董事會的願景

聯合董事會的工作中心是在對基督教的信仰、高等教育和亞洲。聯合董事會工作目的是長期一直提倡全人教育在傳統的人文學科，基督教價值觀的背景。

在亞洲國家具有基督教的大學與學院，聯合董事會與這些機構合作，以加強他們的基督徒認同。在基督教的大學與學院不存在目前的國家，聯合董事會強調的是反映了基督教服務承諾項目和方案。

聯合董事會強調其工作有兩個重點：1. 聯合董事會支持對教師，管理人員，及受託人的專業培訓。2. 聯合董事會支持高等教育的亞洲機構之間的聯繫和網絡。

聯合董事會專注於廣泛的工作，既是贈款決策和方案的組織，綜合性方案，以亞洲的挑戰和應對多樣性。聯合董事會和與其共同目標的其他組織，如教派，學術機構，基金會協同工作。聯合董事會資助其計劃地通過並尋求捐款來自個人，教派，教堂，基金會，亞洲機構的校友，並通過聯合董事會的各種捐贈收入。

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BCHEA)大事記如下：

1922 年，中國的三所基督教大學在美國紐約成立了一個聯合辦公室；

1949 年，與中國 13 所知名的大學建立了聯繫；

1951 年，與中國的聯繫中斷，但是還為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提供支援；

1953 年，積極籌辦自由中國台灣的一所新設的基督教大學；

1955 年，正式開辦在台灣台中新成立的東海大學；

1973 年，東海大學積極謀求擴展，以求自足自給的辦學；

1980 年，應邀恢復了在中國的工作；

2010 年，本土知識行動計畫啓動，專案實施順利，有效的加強了當地社區和大學的有機聯繫；

2013 年，在香港舉行組織成立 90 周年慶祝晚宴，90 位代表列席了慶典，既有捐贈者，也有董事會成員和其他機構的合作夥伴；

2015 年，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過去幾年一直贊助亞洲基督宗教大學協會(ACUCA)，該會目前希望能與台灣亞洲基督宗教大學協會之會員學校，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係。

二、聯合董事會在那些地區服務？

爲達成上述使命，聯合董事會主要透過具有國家和地區性影響力之教會有關團體，在下述各亞洲國家從事教育工作：

1.在香港：爲應付難民之需要，聯合董事會在 1951 年協助創辦崇基學院，直至 1963 年成爲香港政府支助之中文大學三個學院之一，在 1973 年，聯合董事會仍繼續對崇基學院加以特別補助，以協助達成其基督教教育之目標。

2.在臺灣：爲響應國內外基督教領袖之熱心奔走及籌劃，聯合董事會於 1955 年協助東海大學在臺中創校。東海大學乃是中國大陸上 13 所基督教大學結束後，自由中國台灣唯一繼承者，聯合董事會除籌款建校外，並補助經常費，到 1973 年後東海大學就在謀求擴展，以求自足自給的辦學。當時尚存有特別補助金，主要爲協助教員研究計劃、圖書館擴充、公共設施計劃實施等，聯合董事會也同時協助前上海東吳法學院校友，於 1951 年在臺北復校之東吳大學。

3.在菲律賓：自 1957 年起，聯合董事會以事業資金及經常費補助菲律賓西律門大學(Silliman University)，使其六個學院和四個專科部在質的方面更加充實，並且使其農業和社區發展工作更加普及。另外，對菲律賓基督教大學之輔導計劃、師資訓練以及教會間之協調工作亦給予補助。

4.在韓國：漢城延世大學是由賽佛倫斯聯合醫學院(Severance Union Medical College)和朝鮮基督教大學(Chosun Christian University)於 1957 年合併而成，聯合董事會除補助延世大學外，也協助其具有 600 張病院之現代化醫藥中心，延世在 1973 年有 10 所學院，5 所研究所，並且大部已能自給自足。在 1973 年延世所仰仗於聯合董事會，只有籌募主要建築費和特別工作計劃補助費。此外，對於與其他基督教大學間之合作亦多有成就。

5.在日本：在 1973 年，聯合董事會每年供給 15 至 20 個來自香港之中國學生，在日本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讀書之全部獎學金，並且也補助從事亞洲

研究的學術講座，教授交換計劃，和贊助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主持下的亞洲領導人才發展計劃。

6.其他在印尼、印度以及其他遠東及東南亞地區：聯合董事會資助下之工作項目包括有建築設備費之補助、經常費之補助、師資訓練、各國基督教團體領袖人才之培植，各種有關基督教大學校長會議，專才研習會、旅行演講之舉辦，專家、顧問、教授之交換計劃之輔助等。

聯合董事會在 1969 年成立亞洲高等教育委員會，包括 8 位亞洲籍、7 位美國籍之委員，由一位傑出之印度教育家擔任執行秘書，領導工作，設辦公處於香港，為期 3 年，專門研究如何改革及促進基督教高等教育。

三、聯合董事會如何協助？

聯合董事會除了協助亞洲各地區上述各項工作，在美國紐約總部的任務包括：

- 1.安排並支助亞洲教授來美或到其他國家進修。
- 2.物色西籍優資教授赴亞洲作短期或長期任教。
- 3.贈送獎學金給亞洲各大學清寒優秀學生。
- 4.利用新聞報導，出版刊物以及演講，向美國國內地方人士介紹，有關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發展及需要。
- 5.促進美國及亞洲大學及教育機構之合作。
- 6.協助亞洲大學或教育機構之採購，運輸及旅行上之安排。
- 7.輔助亞洲大學畢業生，在美之校友活動及在亞洲之教育資助。

四、聯合董事會之援助來自何處？

為了維持它的工作計劃和服務項目，聯合董事會依靠三種財源：(1)教會贈款，(2)基金利息收入，(3)私人、公司、團體以及基金會之捐助，其他如紀念獎學金捐贈以及遺產捐贈亦所歡迎。所有對聯合董事會之捐贈均可免除所得稅。

貳、聯合董事會芳衛廉秘書長

1942 年，芳衛廉博士成為在中國的美國聯合董事會的董事。1947 年，回到了美國設在紐約曼哈頓的總部，擔任副執行秘書，後來成為執行秘書，並於 1951 年升為總書記，即稱為秘書長，擔任秘書長職務直到 1970 年退休。

一、芳衛廉的個人簡歷

1902 年，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urviance Fenn, 1902-1993)生於在紐約的新羅謝爾(New Rochelle, N.Y.)，他的父親，芳泰瑞牧師(Rev. Courtenay Hughes

Fenn, 1866-1927)也是一位長老教會的傳教士，曾編了一本 5000 字的中英辭典。他的哥哥芳亨利(Henry Courtenay Fenn, 1894-1978)是美國漢學家的建築師和耶魯大學的中國語言專家。1993 年 4 月 21 日，芳衛廉博士卒於賓夕法尼亞州退休社區的 Doylestown，享年 91 歲。他誕生在美國，成長在中國，是一位長老教會傳教士的兒子，本身也是繼承父親的傳教士工作。幼年時在中國渡過，長大後再回到美國，進入漢密爾頓學院唸書，畢業獲得大學的學士學位，而後進入紐約大學，並獲得英國文學的碩士學位，1923 年他開始在 Tungshien 的北美學校擔任英語教師，而後在貝利亞學院擔任教學工作。繼而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完成研究所學業，獲得博士學位。因傳教士使命，1932 年，他與夫人回到中國後，他擔任金陵大學外語系主任，夫人擔任英語教師。1942 年，他開始服務於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以下簡稱聯董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並擔任聯董會駐中國的特別代表。而後他成為美國紐約聯合董事會在中國大陸的主任。1946 年，他與夫人搬回美國，並回到美國的總部設在曼哈頓工作，曾擔任副執行秘書、執行秘書、秘書長。他執行秘書長工作長達有 19 年，直到他於 1970 年退休。

芳衛廉博士已經結婚 35 年的前妻弗朗西斯·科克斯(Frances Cocks)，也是一名教師，已在 1964 年去世。他的第二任妻子普梨西拉·霍爾頓·昵夫(Priscilla Holton Neff)，也死了。他有兩個女兒，在聖地亞哥的莎拉·芬恩盧斯(Sarah Fenn Luth)和在普羅維登斯·羅得島的瑪麗芬恩黑澤汀(Mary Fenn Hazeltine)；共有 7 孫子；8 個曾孫和三個繼子：查爾斯(Charles)，約翰(John)和薩姆夫(Sam Neff)。

二、服務於美國聯合董事會的任務

1937 年中國爆發中日戰爭，到了 1942 年，由於中日戰爭交戰熾烈，國都南京已淪陷，大部分由聯董會所資助的大學，隨著中央政府遷移到大陸內地。這時他所任教的金陵大學已搬遷到四川成都，在往後的三年中，他扮演一位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在中國很重要的主導者與連繫者，提供中國各基督教大學所需要與資源，以維持分散在大陸內地各處的聯董會所興辦的大學於不輟。

根據他給美國聯董會的報告：他曾遍訪福建、杭州、華南、嶺南及沅澧等大學，共花三個月的旅行，距離好像從美國橫渡太平洋到中國一樣的遙遠。他曾經搭乘飛機 3 小時、坐 3 天的火車、3 天的小船及 3 個星期的汽車……。光在重慶市，從滬江大學分部到東吳大學分部，也需要 2 天的路程。在四川成都他興建「中國西部聯盟」之家以招待連繫金陵女大、金陵大學、齊魯大

學及燕京大學等幾所大學。但杭州大學、聖約翰大學及校本部在淪陷地區的滬江大學及東吳大學等，始終無法聯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擔任聯董會在中國地區的秘書、主任。1947年，芳衛廉博士回到了美國的總部設在曼哈頓擔任副執行秘書，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美國聯董會被迫關閉上海的辦公室。2年後，到1951年初，因中共的無神論關係，造成聯董會須完全撤出中國大陸。這時他已被任命為聯董會的執行秘書，而後擔任重責秘書長之職。芳衛廉博士以積極的作為與無比的勇氣，將聯董會帶進一個服務的新紀元。由聯董會所支持的香港崇基學院開始發展，並立即持續不斷的參與及執行，成為一個聯董會重要的使命。

1952年2月初，他受邀到臺灣訪問，回到美國後，4月，他開始有了為臺灣設立一所新基督教大學的構想，並積極推動。終於促成東海大學的誕生，此時聯董會承擔最大與最艱鉅的計劃：聯董會決定用原來十三所大學的經費在台灣成立一所大學，這所大學就是設立在台中的東海大學。甚至於，當時的衛理公會還拒絕了，台北東吳大學法學院所提恢復固有關係的請求，理由是衛理公會，已經同意聯董會在台灣設立一所基督教的東海大學，並已將捐款撥與聯董會，因此無力再支持東吳大學，更何況東吳大學復校並未事先與衛理公會磋商。在芳衛廉的領導下，將近六百萬美元的經費投注到東海大學的開辦，也幾乎耗竭當時聯董會所有的準備金。

接著，聯董會強而有力的贊助日本的國際基督教大學、菲律賓的西律門大學、韓國的延世大學、印尼的撒達亞基督教大學等亞洲各大學的設立，這些大學有部份還是靠聯董會的資助來維持生存。這時芳衛廉博士面對一個困惑的決定，必須將聯董會過去所限定在中國推廣的高等教育工作，帶到分歧而複雜性的亞洲多國性的投入。

從1957年到1960年間，美國聯董會出現財務的危機，使他的領導面臨最嚴重的挑戰，當時隨著聯董會收入的銳減及準備金幾乎耗盡時，聯董會曾過了一段裁減一半經常費的日子。面臨這種壓力，其他的領導人都幾乎失敗了，但終被芳衛廉博士所克服，邀請了美國《時報周刊》創辦人亨利·魯斯加入，並擔任極為重要的財務董事，千鈞一髮才挽回了財務崩潰的危機。結果不僅使聯董會更有效的及更強有力的恢復財務體系，而且建立了聯董會的收入來源管道，才使聯董會能夠在以後多年中，提供亞洲十幾所基督教大學急迫需要的贊助費用。

因此，他所領導美國紐約長老教會，贊助的學院和大學所組成的亞洲基督教聯盟長達有 20 餘年。當時，該委員會整個計劃在韓國，日本，台灣，香港，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以及在中國，泰國，印度和巴基斯坦才能順利的推動高等教育，芳衛廉博士扮演著在中國基金計劃的橋樑，以及對美國各方面的貢獻，在這方面是別人所無法相比擬的。尤其最後的 19 年擔任該會的秘書長職務，極為盡心盡力。他永無止境的奉獻全力來嘉惠成千上萬的中國、香港、日本、韓國、臺灣及菲律賓的學子們，實在是一件難能可貴的義行。古人以「太上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論來判斷個人是否成功？芳衛廉博士一生以協助亞洲國家建立高等教育機構及培育無數的高等教育人才為己志，並全心全力去完成它。他為動亂的社會，重建社會倫理、道德規範及學術專業所付出的精神，非常值得大家的感佩。

三、具豐富辦大學的經驗

百年來，美國紐約基督長老教會在高等教育貢獻上，過去曾先後在中國大陸創辦了 13 所頗負盛名的基督教大學。直到 1949 年大陸淪陷後，各所大學院校盡遭中共合併或改變，因中共無神論而被迫停辦，校舍均遭沒收，到 1951 年所有教會所辦的教育事業被迫中止。

在臺灣的教育界與熱心教育之教會人士，於 1950 年時基於基督教大學事實的需要，聯名向成立於 1932 年，負責襄助過去 13 所基督教大學的美國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 1956 年改名「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建請一本過去培植中國青年學子的精神，期盼於臺灣當地創辦一所理想大學，藉以延續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並傳承淪陷於中國大陸 13 所教會大學之優良傳統。

1952 年 2 月，芳衛廉博士受紐約中國基督大學聯合董事會之邀，來台瞭解並建構一所大學的新校計畫。但由於美援台灣的條件限制，只能接受台灣當地所提出的辦學計畫，當學子完成學業後，應可回自己家鄉幫助經濟發展及提升鄉村生活水平。因此，他來台與國內教育人士及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領袖們討論設校條件，以便提出重新建構一所新基督教大學計畫，返美後，於 4 月 2 日，芳衛廉即向美國紐約聯合董事會提出「我所欲見，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錄」，建議的重點是要讓美國紐約長老教會在台所設立基督教大學的構想予以支持。其詳情如下：

「我建議聯合董事會，對於台灣基督教團體，欲在台灣設立一所基督教大學的構想給予支持，我認為這所大學不應只是大陸任何一所大學的翻版，

台灣所需要的是不一樣的大學，既然是從無中生有，我們大可有機會創立一所不同形式的大學。我瞭解後心想因襲過去大陸傳統大學的念頭很強，但如果我們不能成功抵制這個想法，我們注定會失敗。所以下面是我心目中所理想大學所應具備下列的十四特色：

1.這所大學應依籌備委員會上所述的：『造就具有特殊視野與終生奉獻精神的人，希望他們中的大多數將來已服務教會及國家為職志。』雖然我們應以最好的教育設備培育每一位學生的領導才能，但是我們不只以培育領導人才為唯一的目的，我們同時也希望造就一些『僕人』。

2.這所大學應與其所屬的環境密切聯繫。雖然長久以來這些環境一直維持農業的形態，但是我們並不打算把這所大學建成一所農業大學，也不打算訓練這方面的畢業生，或造就一大批回農村工作的人。但畢業生不論將來在都市或在鄉村工作，他們應該不要忘記整個台灣至少有 80%以上農村人口的利益。以最廣泛而又最富有意義的話來說，這所大學應以服務台灣島上的居民為目的。

3.這所大學的課程設計難以專業性貫穿整個課程，但不應以技術性的專業為取向。大學教育不應只是某些工作或職位的訓練班，而是訓練出可以馬上適應社會、服務人群的人才，它以不限制一個學生未來的發展為目的。

4.這所大學使學生生活在充滿各種觀念激勵的氣氛中，許多課程可以為適應台灣社會需要而設計，但所有課程都應涉及基本的以及充滿挑戰的觀念。科學的課程要以文化為背景。而人文、社會學科的課程應賦予實質的意義，不可自限於象牙塔中，應由校外真實範疇提供的活動中達到此一目的，課程所應著重的是通才教育。

5.這所大學不是白領階級的養成所。不論男女同學都要訓練勞動的習慣，有朝一日他們出了社會了才不會怕污物沾身。勞動意味著學校用最少的服務人員，師生過著最儉樸的生活，勞動同時意味著對校外社區提供實際的社區服務，我認為貝利亞(Berea)和安提克(Antioch)兩所學院的獨特理論可以部分在台灣採行。

6.民主的觀念在行政上以及師生關係間，都應有實際的表現，全體教職員都應投入。這意指學生儘管有成熟度的限制，但仍可決定他們自己的活動並在教育上參與行政與學術事務的討論。也意指教員有責任參與學校的基本決策，此為教育過程中學校逐步成長的要素。

7.這所大學應避免各系自己閉門造車，教員追求的是真理而非自築高牆。

學校應幫助學生瞭解狹隘本科系中更廣闊的關連性與其涵義，學校同時應鼓勵教師從事集體研究而非只埋首於個人計畫之研究。

8.這所大學將是一所不超過五、六百人的小型大學，因為人數太多會危及基督教理想氣氛的發展與維持。雖然學校應維持學術上的高水準，但入學資格除了學業成績外，也應在學生性格與志向上予以充分的瞭解。學費應從學生平均財力中核定，合於資格而無力繳交學費者不應摒除門外。

9.為了配合學校的目標與資源，科別的設置應有限制，不是應有盡有而是有選擇性的幾個科目不斷予以加強。適合設置的科目包括社會科學(理論與實際並重)、教育(理論盡可能少、實際內容盡可能多)、英語(實用與瞭解西方文化並重)、基礎科學(既不是不實際的純科學，也不是僅以職業為導向的應用科學)，另外全體學生應修哲學與宗教課程。

10.這所大學的校舍樸實，但並不是一無特色，是實用而不虛飾。此一校舍不僅由目前的條件所決定，且希望有一天這所大學能得到本地的支持。此校舍應與周圍景觀及所屬的環境相配合。

11.教員必需專任，因為只有全心奉獻教學與研究工作，才能充分以其理想與理念貢獻學校，長遠來看，這正是一所大學成型的基本要素。每一位教職員都可以獲得較佳的生活待遇，這並非意味著高薪，而是指較公立學校待遇為優。薪資的給付也應顧及家庭的大小，譬如只有一個孩子的主任薪資與兒女成群的雇員薪資差別不大。

12.這所大學的教職員應是基督教徒。我知道要求教師學術與基督教資格並列並不容易，可是過去在大陸的基督教大學十分強調這個條件的重要性。

13.這所大學雖具有國際性，但強調國際性並不表示抹煞其台灣的特性。國際性的合作在開始的階段有其重要性，西方人士的參與也在歡迎之列，不過我們需要的是一所真正為台灣人辦的基督教大學，所以西方人士與中國大陸人士應為從屬地位。

14.這所大學一開始即與教會保持連繫，因聯董會代表教會，所以應與其合作無間。為了防止因用人不當而使學校管理脫軌，教會組織對學校的事務應有最高的決定權。這所大學不只是基督教大學，而且是與基督教會相互連繫的大學，它不以狹隘的意義為教會服務，應支持並強化對台灣教會的貢獻。

總而言之，我希望申明我的信念是一所有以上的十四條，或其他要項共同成為台灣某些人，以及某些團體的想法時才有意義，如果有任何與聯董會的目標不相符合的計畫，以及加上共同合作的人無法全心全意地參與其事，

會使聯董會參與的意願都會大大降低，因為這種合作並非明智之舉。最後，我們應認清楚，聯董會面臨的最基本、也是最首要的任務就是教育。」

隔年即參考過去在大陸 13 所大學，在台中大度山創辦成立東海大學，並非完全延續大陸基督教辦學傳統。這所大學不只是基督教大學，而且是與基督教長老教會相連繫的大學，它不以狹隘的意義只作教會服務，應廣泛的支持並強化對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貢獻。

四、創辦東海大學的特色

早在 1951 年 6 月，曾任燕京大學會計長的蔡一謬先生和魏德光博士(兩人後來都擔任東海創校董事)就向 UBCCC 爭取補助台灣高等教育。同年 9 月，東吳大學校友首先向該會爭取在台復校：金陵、燕京大學校友也建議以「聯合流亡大學」(a joint institution-in-exile)的名義在台復校。但 UBCCC 下設的「亞洲服務臨時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 on Services in Asia)在 1952 年 4 月初經過討論，維持一年前既定的立場：認為不宜支持以任何一所，過去在大陸的教會大學名義在台設立「流亡大學」(a university in exile)。而且在美國聯合長老教會代表 Dr. Charles Leber 的堅持下，必須由台灣本地長老會主動提出申請，方可在台設校。1952 年 9 月 Dr. Charles Leber 美國聯合長老教會，以亞洲事工負責人來訪問台灣，曾與黃彰輝談及在台灣創設基督教大學。

依芳衛廉心目中所理想大學所應具備的特色中，以第一點與第二點所敘述字句最為精確，為了符合美國聯合長老教會代表 Dr. Charles Leber 的堅持，因此他主張，東海大學不應該是任何一所在大陸的教會大學翻版。他說：「這是一個開始，我們有機會去創立一個不同型態的大學。」所謂不同的形態，包括：「這所大學應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

他所強調：這一所學校不是在製造白領階級的大學，學生對其生活環境應有不斷的自覺，以避免陷入象牙塔，流為士大夫，另外，東海大學應落實民主觀念，學生需具備生活思想。在課程設計方面，不須以技術性導向，而應著眼於寬闊格局，避免嚴格的分科，配合當地國家與社會的需要，搭配純樸而不會矯飾的校舍。

芳衛廉始終認為，台灣需要的是一所不一樣的大學，既然是從無中生有，大可有機會創立一所不同形式的人文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他建議，東海大學初期的規模，以小規模大學型態，重視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學生人數大約在 500 至 600 人。師生全體住校，教職員必須全職，並提供最佳生活條件，且應是為基督教育。他非常清楚，部分籌備學校委員，承襲傳統大

學的念頭很強，但他堅持，如果不能成功地抵制這種想法，這所大學注定會失敗。

依芳衛廉心目中一所理想大學所應具備的特色中，以第四點敘述字句最爲精確：「這所大學使學生生活在充滿各種觀念激勵的氣氛中，許多課程可以爲適應台灣社會需要而設計，但所有課程都應涉及基本的以及充滿挑戰的觀念。科學的課程要以文化爲背景。而人文、社會學科的課程應賦予實質的意義，不可自限於象牙塔中，應由校外真實範疇提供的活動中達到此一目的，課程所應著重的是通才教育。」他認爲，創校之初就應依照已規畫要實施通才教育，東海便自許應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是一個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的土壤，而非製造白領階級或象牙塔士大夫的大學。因此，通才教育的核心理念是著重學理的闡揚、技術的傳授及思想的啓發。

通才教育是當時(1950 年代)美國高等教育的潮流，深受哈佛大學通才教育理論的影響。聯合董事會芳衛廉秘書長事先徵得曾校長的同意，1956 年 3 月，聯董會芳秘書長，就邀請菲律賓基督教會 Silliman 大學已退休的校長賈爾信博士(Dr. Arthur L. Carson)，來校規劃擬定通才教育大綱與實施方案，同年 9 月，特別聘請美國紐約史基摩爾學院(Skidmore College)教育系主任朱有光博士(前大陸嶺南大學文學院院長)，來校指導擬訂東海大學通才教育有關課程，在一個月之內就把大家的意見綜合起來，編成了東海大學通才教育的藍本。內容恰和備忘錄中的「課程內容不限於和謀職直接有關的技術性題材，而應比較廣泛，不謀而合」，同時朱博士也把通才教育的課程和專才教育的課程銜接爲一個體系，是爲東海兩者得兼的「通、專」教育。

當時，通才教育分成自然領域、人文領域、社會領域等三門共同必修領域，自 1956 年秋開始推行，一、二年級學生對各領域兼修的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普遍實施，所有學生必須修習國文、英文、歷史、音樂、宗教。因校園學生日增，專業教育漸興而失去了這些制度傳統，但東海大學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底蘊仍在，校訓「Truth attained through faith expressed by deeds.」(藉由信心而獲得真理，並以實際行爲來彰顯之)指明我們是將信仰與知識、行動透過全人展現的教育機構。

另外，依他心目中一所理想大學所應具備的特色中，以第五點敘述字句最爲精確，他認爲，「這所大學不是白領階級的養成所，不論男女同學都要訓

練『勞作』的習慣，有朝一日他們出了社會才不怕污物沾身。」「這個『勞作』，是意味著學校用最少的服務人員、師生過著最儉樸的生活，『勞作』同時意味著對校外社區提供實際的社區服務，我認為美國貝利亞(Berea)和安提克(Antioch)兩所學院的獨特『勞作理論』，可以部份(工讀制度)在台灣採行」。

這些建議，促成了東海大學在民國 42 年(1953)11 月 10 日，召開在建校籌備階段的第二次董事會議中，通過了東海大學「設置的目的與方針」中，明訂「勞作制度」(Labor system)為大學基本教育方式之一，這是國內在高等教育中首創的一種教育制度。事實上，芳衛廉早年曾在美國肯塔基州的貝利亞學院任教，認為該校的「工讀勞作」(Work for study)可在東海實行。另外他說，過去在中國大陸的大學，包括基督教大學在內，所造就的是動腦不動手的「士大夫」，而東海大學要造就的是手腦並用的人才。因此，東海大學在國內在高等教育中首創的一種教育制度，即是基本勞作(Fundamental labor)制度，而且所有入學新生的必修課程之一，視同一門學業的課程。

因此學校在還沒開學之前，他就安排曾校長與吳德耀博士，到貝利亞學院去瞭解該校的「勞作制度」。事實上，貝利亞地區當地居民相當窮困，其工讀勞作的動機全起於經濟，學生勞作是有報酬的，學生可用所得來補賞，做繳交學、雜費、膳食、生活費等。但是臺灣的狀況並不相同、環境也不相同，經過研究商討，決定不是全部採用，而把東海的勞作當為一種教育，也就所謂為勞作教育(Labor for Education)，培養將來出社會是一位有用人才。

「勞作教育」已成了東海大學一項特殊傳統，只要是東海新進的學生，不分男女、不分家庭背景及社會地位，都必須要做兩年義務性的基本勞作(Basic labor)，包括清潔宿舍、整理校園環境、洗碗掃地、洗廁所等 20 多項工作。

五、孕育東海大學正式開辦

黃彰輝牧師是個相當有遠見的教育工作者，認為台灣需要有一所以基督教信仰所建立的大學教育機構，來栽培國家社會的菁英、造福當地社會。因此，在他努力之下，爭取到「美國基督教大學聯合基金會」董事們的同意，由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向該基金會，提出申請在台灣設置基督教大學，並且為了讓該校不是單屬於長老教會所創辦，在董事會中南部基督教長老教會僅派三名代表，其餘董事名額則由其它宗教派系推出來共同組成，這就是東海大學創辦的由來。早在東海大學重新在台灣尋求建立發展之初，陳明清先生

與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等，代表台灣南部基督教長老教會參與籌設工作。

當初，某些中國大陸基督教長老教會人士，認為台灣只不過是大陸的一個邊陲延續，而東海大學在台灣的發展，自然成為大陸基督教大學的「復校」，而聯合董事會本身也毫無台灣本土辦學經驗，但陳明清先生等教會人士心目中，卻有一所理想的基督教大學的教育藍圖。因此東海大學的籌設，絕對不是大陸基督教長老教會來台另起爐灶，也不是大陸邊陲的延續；他們視之為貨真價實的台灣基督教大學教育之籌設，而且需具有台灣鄉土特色的風格。陳明清先生參與東海大學建校的籌備，之後也代表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出任董事會，這正是他重視基督教大學教育的一項明證。可惜最終因以本土為主的教育理念與其他主事者不合，以致他退出董事會。想必這樣的結局多少帶給他壯志未酬的遺憾。

大概可以勾勒出，在東海的創校初期，其中南部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人，就有黃彰輝、黃武東、彌迪理、陳明清、蔡培火。原來台灣的先輩真正要創立的，是屬於台灣的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大學，而不是為了中國淪陷而「復校」。而基督教長老教會大學的理念，只是單單這樣嗎？最後他們向聯董會呼籲，建校將面臨的最基本、也是最首要的任務乃是要設立一所完整的大學教育。1953 年 6 月初，聯董會派美國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前神學院院長葛蘭翰博士(Dr. Thomas W. Graham)為該會代表，偕同芳衛廉來臺與國內教育家杭立武博士接觸，討論籌備建校及籌組董事會事宜，並撥款美金五萬元作為籌備費用。6 月中旬，正式成立基督教大學籌備處，推舉杭立武博士為籌備處主任及首任董事長。

聯合董事會同意在台設大學的消息傳出去，全台各地，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均紛紛爭取未來的大學在各地方設校，其中台中表示願意提供大肚山(後改名大度山)山麓八十多甲山坡地。經過多方考量後，籌備委員會選定在台灣中部的台中市西屯區大度山建校，也因大度山是在大海之東，籌備處主任杭立武博士本想以「海東大學」為校名，當年 8 月 11 日籌備處會議中，雖有委員建議校名有玉山、海東、協和、聖保羅……等，為了廣泛徵求更多的建議，會中決定發出約 50 份邀請函給教育文化界人士，包括第三學院的建議。但經數月的思考，並和幾位史學家商酌，最後接受名史學家羅家倫博士的提議，採用 8 月 14 日台灣大學凌純聲教授(1957 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

院士)回函建議校名為「東海大學」而定之。

東海大學就是隨著芳衛廉博士所提供的補賞金進行購買校地，多年的醞釀與台灣方面杭立武董事長、台南神學院黃彰輝院長、副院長彌迪理牧師(Rev. Harry Daniel Beeby)和台灣長老會蔡培火長老等創校董事的奔波協調，完成購地建校。芳秘書長本決定每年由聯董會提撥 7 萬 5 千美金，約 8 年，計 60 萬美金。但在 1954 年 1 月 12 日的 4 次東海大學董事會中，表示若有需要，可提升至 10 萬美金，而總金額可提升至 75 萬美金。

東海大學的校園空間是由貝聿銘先生負責，1954 年 4 月，邀請陳其寬、張肇康先生共同參與。初步設計都在美國紐約進行。1954 年 8 月，全部草案決定後，於 11 月寄回台灣，獲東海大學籌備處通過並付之執行建造，先由美國范哲明建築工程師、後增香港楊介眉建築師共同負責執行，並委託台灣本地林澍民建築師繪製施工圖，招標興工，營造工程由大陸工程公司負責。1955 年 3 月，對本地林澍民建築師繪製施工圖反應不佳，而後告知貝聿銘先生，寄望能加以改進。原本貝先生向學校建議，可以聘請他的哈佛同學在台北開業的王大閔建築師當顧問，可是學校董事會經開會結果不予同意。於是，貝聿銘先生只好將其手下兩名我國建築師，派駐東海大學工地，做好督導工作。1956 年 8 月以後，先由張肇康(1956,8)、繼由陳其寬(1957,9)兩位建築師由美來台，負責監督後續工程的進行。特別的校園空間設計，使得東海的校園整個建築享譽國際。尤其是，路思義教堂的建造，更被視為是現代建築的經典案例。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在東海大學早期樹木尚未繁密之前，校園內任何一處地方都可看到教堂，這是東海大學的精神堡壘。芳衛廉秘書長再三強調，只有以上的 14 條或其他要項，共同成為臺灣某些人及某些團體的想法時才有意義，如果有任何與聯董會的目標不相符的計劃，加上共同合作的人無法全心全意地參與其事，聯董會參與的意願都會大降低，因為這種合作並非明智之舉。

1955 年 10 月 31 日，第一屆東海大學學生正式入學，計註冊入學者共 195 人；11 月 1 日，辦理選課手續；2 日上午 11 時，在臨時大禮堂--倉庫(現已拆除)舉行創校始業式典禮。因為當時只完成部分的男、女生宿舍及餐廳，所以學生上課、實驗、聚會……等，都在男生宿舍區進行。至於大陸工程營造公

司所承包的文學院、行政大樓、圖書館、理學院……等工程，都正在施工進行中。

典禮由本校首任校牧穆藹仁牧師主持，建築物奉獻儀式則由本校董事長杭立武博士主持，繼由曾約農校長發表簡短演講，第一屆中文系學生蕭欣義代表全體學生致詞答謝；西屯區區民並致贈本校「有教無類」匾額一方。典禮完畢即行正式上課，教室、圖書館、實驗室均暫借男生宿舍--東海大學正式誕生，並定是日為校慶日。

勞作教育也在這天開始實施，蕭查理博士拿著雞毛撢子和掃帚向同學們講解勞動的意義，隨即分組勞作；曾校長被分在第十三組，蕭查理博士發給他一枝雞毛撢子。

會計長畢律斯女士致聯董會的函件中，詳細地描述這個值得紀念的一天。這一天，陽光普照，並不冷，反而有點熱。午後，有名的風開始刮起，使天空中蒙上一片黃色的塵埃。每個人都辛勤地工作，使倉庫還看得過去；講壇是用松木所作成的，但已著上了灰色，擺上一束乳黃色的劍蘭。由於認為這是學校的聚會，所以沒有家長，也沒有旗幟。這一天的開端是早上七點鐘的早餐，七點四十五分舉行升旗典禮，然後學生進入倉庫練習始業典禮中要唱的詩歌。典禮在十一時整開始，簡單、隆重，而且富有宗教氣氛。

在拍攝一大照片後，全體共進午餐，師生都吃的十分簡樸，因為曾校長要讓來賓知道東海人是怎麼生活。畢律斯女士說：「整體的印象是，我們已在一個非常高的水準上開學了，一切都那麼隆重。我感覺到學生們會有更深刻的印象，他們以真誠的心靈齊頌聖歌，並且溶入其中。」曾校長在致聯董會的函件中亦感性地說道：「這真是美好的一天，風刮著，這使我在內心中稱呼我們的校園為森林神(Zephyrs)。但是來賓及學生並不在意。事實上，臨時禮堂太過擁擠，所以我們更歡迎風的吹拂。」

1955 年 11 月 14 日，《時代週刊》(Time)，以「拓荒者」為題，專題報導本校的開學，並特別強調本校所進行的是「十分前進的革新」的教育計畫。並引述曾校長的一句話：「開創將是我們的格言(Pioneering will be our watch word)。」東海大學就這樣開始了開創性的教育事業。

許多老東海人認為，如果當年沒有聯董會秘書長芳衛廉博士所提出如此深刻、具有一針見血的實質建議，則今日的東海，可能僅是一所傳統基督教大學而已。